



深度决定高度 新闻影响生活

深读

周刊

星期一

2014.6.30

齐鲁晚报

B01-B02

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有大大小小六百多个,大多分布在繁华市区的山坡上。

CFP供图

足球之外的“巴西梦”

经济奇迹、贫富差距、高城市化率都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

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实习生 黄蓉 王书境

22岁的内马尔似乎是要复制前辈们的神话,世界杯将全球的目光汇聚到巴西这个南美最大的国家上。这是南美大陆时隔36年再次举办世界杯。

这个诞生过贝利、苏格拉底、罗纳尔多等超级球星的国度,除了激情的足球和迷人的桑巴,很多人并不知道,上世纪50—80年代这个国家还曾创造过一度令世界为之瞩目的“经济发展奇迹”,并曾有过“20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”的豪言壮语。

但如今,伴随着一系列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变,这个曾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大展身手并欲实现自身崛起的国家,在发展道路上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挫折,以至于早已复归了平静。

但平静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,对于人均收入超过1.2万亿美元的巴西来说,“第二次崛起”已经不再只是梦想,当然,这条路途依然不会平坦,现今环视巴西国内,工业发展不均衡、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仍然存在,对于巴西而言,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魔咒至今仍未完全被甩脱。

以人为鉴,可以知得失。对于目前仍在经济发展之路上飞奔的中国来说,同为“金砖四国”的这个兄弟国家已经走过的和正在走的路,很可能就是以后我们要走的路,从这个意义上说,研究巴西,更重要的是为了发展、充实自己。

桑巴之国的“经济奇迹”

对于“桑巴之国”巴西而言,再没有什么比足球距离它更近的东西了,包括它的经济。

巴西第一次捧起世界杯是在1958年。这是球王贝利的第一届世界杯,这一年他还不满18岁。

而正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,原本以典型的“亚非拉”落后形象示人的发展中国家巴西,随着世界杯的夺冠开始了经济的腾飞,并创造了堪称“经济奇迹”的巴西发展模式。

在1951—1980的30年间,巴西年均经济增长率在6.8%,特别是1968—1973年,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1.2%,而1973年甚至创下14%的年均增长纪录。

尽管与上世纪70年代末步入改革开放时期,并创造了年均经济增长率9.8%(1979—2007)的中国经济相比,尚有一定差距,但在1980年代之前,巴西无疑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领域最受瞩目的国家之一,在那个“意识形态挂帅”的年代,笼罩在美苏两极争霸阴云中的桑巴之国,以其独有的发展模式,向世界宣告着自己的存在价值。

有趣的是,在这三十年“经济奇迹”过程中,巴西又分别于1962和1970年两次夺得世界杯,经济的发展与足球的辉煌几乎同步,二者相映成趣。球王贝利成为至今世界上唯一一位夺得过三届世界杯冠军的球员,为祖国巴西永久保留雷米特金杯。

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对国家前景的“信心爆棚”。正是在1970年,在海迪西政府执政下处于巅峰发展状态的巴西,凭借经济的崛起,甚至喊出了“在20世纪末融入发达国家行列”的响亮口号。

1960年,巴西政府甚至将首都由里约热内卢迁至巴西利亚,试图促进内陆的开发。

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曾掀起过一阵研究“巴西崛起”的热潮,在学者看来,“未来之国”、“潜在大国”的名头,对于巴西而言实至名归,这个“拉美奇迹”的领头羊,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,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期待。

一切,似乎都在朝着无比美好的方向发展,如果不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石油危机,21世纪说不定又会被某些乐观的预言者称为“巴西的世纪”了。
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魔咒

事实证明,“巴西梦”很快面临梦醒,一个叫做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巨棒,兜头

将雄心勃勃的世界经济新贵巴西“打回了原形”,遭遇世界性的经济危机,加之错失转型良机,在这个原本“出线形势”一片大好的国家上空,笼罩了一层久久难以挥去的阴影。

按照世界银行对这个概念的解释,身陷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后,鲜有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例子。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,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,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。

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石油危机的到来,“巴西奇迹”戛然而止。

“疯涨的油价,国际资本的短缺,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需求的下降等因素,让巴西经济从1970年代中期就进入了尾期。”6月27日,中国社科院巴西研究中心秘书长周志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说,而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,全盛时期经济上曾经有过两位数增长的巴西,一度转入负增长的困局:1981年为-3.1%,1983年为-2.8%。

与负增长率相伴随的是不断高企的外债和通货膨胀率:1973—1984年,巴西外债余额从125.7亿美元增加到910.9亿美元,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,从15.9%增至43.1%,通胀率从14.9%猛增到220.6%。

曾经的经济奇迹缔造者巴西,已经成为人们眼中“永远的未来之国”。其实即使没有国际客观因素制约,巴西经济发展本身已经存在了不少问题。

此前奠定了“经济奇迹”的进口替代模式和“举债发展”模式,也成为人们主要的反思对象。

所谓“进口替代”,简单说就是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,主要途径是通过限制外国的工业制成品来促进本国工业化,巴西的这一发展模式起于20世纪30年代。

客观来说,这一政策下的巴西很快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,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:由于缺乏竞争环境,导致垄断企业效率低下,产品质量不高且价格居高不下,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日益突出。在面临世界范围内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时,巴西仍然在“举债发展”,推进耐用用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,从而错失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时机。

与经济方面相伴随的,是前期经济高速发展光芒下所掩盖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集中爆发,其中之一,便是过度城市化所带来的城市贫民窟林立,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。巴西新首都巴西利亚几乎从它建成的第一天起,批评声就从未停止过。迁都没有解决前首都的“城市病”,却造就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新城市。

“按照指标衡量,目前巴西仍处于‘中等收入陷阱’上下范围内。”长期致力于巴西研究的周志伟分析,经济疲软,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的存在,让巴西至今仍难

以摆脱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梦魇。

巧合的是,巴西足球也在这个时期霉运不断。拥有“舞蹈家”身材和医学博士头衔的苏格拉底,代表巴西队参加的第12、13届世界杯大赛,都在1/4决赛中被淘汰出局。尽管苏格拉底在1982年被评为世界十佳球星,但他仍十分沮丧。

经济发展与社会难均衡

不过,进入到新世纪后,巴西人似乎看到了一线转机。

2003年前后,高盛公司提出的金砖四国(BRICs)概念,让巴西再次跃入人们视野。其实在此之前,自1994年雷亚尔计划开始,巴西便重整旗鼓,奔向“第二次崛起”。

而巴西经济重获动力的原因之一,在于一些体制上的障碍的扫除,从卡多佐、卢拉到卢塞夫,控制高通胀率,垄断企业私有化改革等一系列政策的推行,逐渐解除了捆绑在这个国家身上的枷锁。

“如果说经验,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。”周志伟认为,既不能过分强调政府的管控作用,也不能一味强调无形的“市场之手”的作用,“处在什么样的阶段,就要采取相对应的政策。”

进入20世纪90年代,巴西推行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,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,放开经济,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,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。

“这个阶段巴西已经不再是高速增长,而是速度适中的增长。”周志伟认为,自2003年执政以来,卢拉政府谨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,促使巴西进入20世纪70年代“巴西经济奇迹”以来的最快且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,巴西重回世界经济十强之列。

但是,经济的增长并非万能,深埋其下的社会问题,并未得到根本改变。

中央党校学者陈江生在《拉美化陷阱:巴西的经济改革及启示》中曾援引一组数据称,1993年20%巴西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占到了全国总收入的58.7%,基尼系数超过了0.5,进入21世纪后甚至一度逼近0.6,成为世界上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的国家。

而遍布巴西大小城市的贫民窟,则成为这个国家贫富分化最明显的标记。

学者胡续冬在其旅巴游记《去他的巴西》中,对于巴西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有过如此描绘:大大小小六百多个贫民窟……大多分布在繁华市区的山坡上,虽在摩天大厦、时尚街区之侧,但完全与世隔绝、自成一体,俨然城中的山寨。远望这些“山寨”,一个个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破旧、杂乱的棚户,像是史前时代的部落。

(下转B02)



扫码关注深读周刊
微信“红蓝铅笔”

出品:深度报道部 编辑:任鹏
设计:壹纸工作室 许雁爽 组版:庆芳